绪　　论

（一）

作为绪论究竟应该写些什么，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理解。笔者的心愿是想借此谈一谈与本书相关的背景情况和对书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的理解：

(1)解题和研究的视角及内容

在 2002年 6 月份，我有幸拿到了一个国家社科项目，虽是个一般项目，但国家给予的资助力度非常大。国家的信任和前辈的扶掖给了笔者以极大的激励，笔者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从历史的角度经过缜密的研究而总结出一点历史的经验，以之为国家的西部大开发国策从历史经验上给予积极的呼应和支持。这样想与做，说到底是想要发挥史学的继往开来的基本功能。历史学在培植中华文化的根基、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并对中华文化的发展给予正确的导向诸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史鉴的作用。现在的西部大开发，从其必要性、合理性及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性诸方面来说，都是应该也有可能从历史上找到其相应的、合理的原因的，应该存在着一个与今天相对应的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部待开发的历史形态，以作为今天西部开发的历史前提；或者存在着某种开发过的却不很成功的历史尝试。这一切都有待于笔者通过研究去追寻逝者留下的脚印，去汲取其中宝贵的历史经验。所谓的开发就是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就是追求东部和西部的平衡发展，而使西部赶上发展较快的东部地区，在近代中国也是如此。

虽然本书的题目是《清代西北边境地区中俄贸易——从道光朝到宣统朝》，但是书的内容并不局限于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内容，在阐述这些内容的过程之中，笔者将清政府的西北地区对外开放政策的沿革过程，中俄之间就贸易问题的一系列条约及其作用，俄罗斯在中国西北部开放方面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以及中俄西北地区贸易与恰克图贸易的比较，边境贸易对中俄两国的不同影响等方面的问题加以分析。研究的结果使笔者深信，近代历史上的中国西北部开放有其成功的经验，更有其失败的教训，总的来说，属于一种被动式的开放。其原因主要在于清政府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存在片面性、阶段性或准备不足，对西北部地区在全中国的重要位置、对如何经营西北部的问题缺少统筹规划。在清政府内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官僚集团提出的海防重于塞防的主张，貌似客观实际短视，无限激发了俄罗斯对伊犁地区的凯觎之心，而参加收复伊犁的谈判官员又以当时中国人对贸易的认识去揣度俄罗斯人，在中国和俄罗斯在伊犁问题上的交涉，清政府以保住疆域划清边界为重，把允准贸易作为一种保住疆域划清边界的谈判手段；俄罗斯方面则把领土与贸易均作为外交谈判要达到的目的。于是清政府冒失地认可了条约中的很多条款，正是这些条约给了中国西北部地区以无尽的损害。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有它的昨天和今天，历史的延续性岂能割断。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后来人为自己的前辈的失误和历史局限性，承担着本来应该由前辈来承担的责任，是今人在前人经营西北地区所达到的高度上又一次推进，在这里最关键的是今人要看清前人在经营西北地区的过程当中，成功与失败之处各在哪里。鉴于此，本著作

把分析研究的重点就定位在这里。SARS 过去之后，笔者有一部专著问世,题目是《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该专著被清史学者称为‘是目前国内研究中俄恰克图贸易及其相关问题最深入详尽的著作”，[①] 这样好的评价使我深受鼓舞，也为目前手中的这部著作《清代西北边境地区中俄贸易——从道光朝到宣统朝》初稿的完成，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和提供了一些好的学术经验。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极其丰富的修史思想和主张早已成为一种传统，成为今天修史所应该承继的部分。中国在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一切必然深刻地影响到史学领域，人们在期盼和呼唤着新史学，这种期盼与呼唤的真实动机在于启发历史学的时代感和责任感。很多人在谈论着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如果把他的这种思想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看，可以看出新史学是和新文化的构筑相联系着的，是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新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不断更新，并不是只靠西学的引进。新史学思想给我们的启迪，依笔者之浅见，就是要依照历史学本身所特有的规律去做。首先治史要求其‘真和通”,当然包括专史在内,要把所研究问题的沿革搞清楚，要求其与今天的现实相通，使人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是谓通。因此必须要依时叙事。笔者认为，可以从大历史与小历史相结合的角度去切入，同时也特别关注与所研究客体相联系的各种历史现象，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或同时发生或前后发生的，或较远的、连带发生出来的历史现象，均应在视野之内，从而使史料更加丰富，以便于全面思考。必须要有翔实、可靠的史料，史料必须是经过筛选的才可能翔实，也就是先要做好资料长编和对长编中某些不同记载的考异。在这样的基础上认真思考，而后酣畅叙述。以史实说话，在史料当中已包含着自身的结论，实仍可以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笔者心仪于实证的方法，

①常建华《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研究的新收获》《清史研究》2004－1。

主张用史料说话，尽显史料的魅力。非不论也，但求论得恰到好处而已，因为论是对一个人的学养的全面检验。笔者深信，即使表面上看似无关的历史事件，其实是有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内在的、逻辑的联系的。在所谓的去意识形态化（其实仍存在着）之后，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实证研究并不是传统考证史学的回归，而是更属于一种扬弃，是继承后的发展。这种实证史学的任务是要把史学带出注释史学的阶段，走上恢复历史真实的道路，即历史学家首先应该负责任地告诉后人，历史的真实是什么（尽管不会完全恢复历史），这同时也是一切研究的本原和出发点。如果连真实都成了问题，那么所谓的研究岂不成了空中楼阁？科学性全在于真实性。历史学家还要告诉后人，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当浮躁笼罩着中国大地时，用夹生的西方人文学说诠释所研究的对象，或许还不如历史学的意识形态化更成熟。实证史学之出现是史学发展之必然，是对前意识形态史学的一种反动。

任何一个课题都有不同于其他课题的、其本身所特有的研究对象，研究的范畴，它自己的相对的惟一。本研究的范畴并不是一般经济史意义上的边境口岸贸易史，而是对近代中俄边境贸易这一领域，以及对这个领域之中的一个方面，即近代中俄西北边境贸易状况，在历史多层面上作深入的考察，更多地分析政策对贸易本身兴衰之影响。它是宏观的审视和微观叙述的有机结合，它对中俄西北边境贸易的研究紧紧扣住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因此它被笔者冠之以大视野，所谓的大视野就是类同于黄仁宇所主张的大历史。进入作者视野中来的史料应该是丰富的、多层面的，历史的、合理的逻辑客观地把这些史料血肉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本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去发现这种客观的、历史的、非主观臆造的逻辑，透过现象看其本质。

为什么把本著作的上限时间定在道光朝呢？因为道光朝是承上启下的重要朝代，道光帝在西北边境的以民为本的治边政策，为咸、同、光三朝的新疆政策以及新疆建省奠定了基础。真正可以称之为中俄西北

边境贸易的，在笔者看来是在新疆建省之后。为了有整体的沿革感，为了探究清代在西北边疆地区政策上的连续性，也是为了使人们对进入西北边境贸易之前的新疆有一个背景上的认识，看清西北边境贸易的历史起点是怎样的，故决定从道光朝写起。

笔者认为，如果从道光朝到宣统朝这样一个时段内来考察近代中俄西北边境贸易，那么以下的这些问题是在研究当中必须涉及的：

A. 在恰克图贸易已持续百年并仍在发展的时候，中俄西北边境贸易开始，它的历史起点、背景、特点、演变的过程及影响是什么；

B. 中俄西北边境贸易从伊、塔通商章程算起，到宣统朝清灭亡，它的发展阶段是什么，每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如何；

C. 光绪朝新疆建省以后，经过阿克苏道、镇迪道、喀什噶尔道、伊塔道进出新疆的俄商货物状况，对俄、中两国的影响如何；

D.《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签订后恰克图边境贸易和中俄西北边境贸易的比较；中俄西北边境贸易正式开始的标志；

E. 俄罗斯在华贸易口岸布局的变动过程；

F. 嘉峪关的俄商出关税收记录证明，新疆成了俄商品倾销的市场；

G. 清政府对待中俄西北边境贸易的政策及其演变，结合对《中俄伊塔通商章程》、《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及《圣·彼得堡条约》的内容分析与评价,尤其是《圣·彼得堡条约》严重后果的分析。

笔者将从不同的侧面就这些问题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

(2)去伪存真、全面、准确地使用史料

历史研究所应遵循的惟一原则就是实事求是，采用科学的手段，尽可能地恢复历史的真实。而在历史的真实的恢复过程中，总是期望着能够找到最全面、最直接的相关史料，因此有人说史料就是历史，尽管有一些学者对此有他们的保留。有比较才能鉴别，对史料进行比对才能发现不同，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分析和思考，力求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会有如此的不同。比对就是考异，力争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探索中俄西北边境贸易所固有的、而非主观臆造的特有规律，来实现对在这样一种历史跨度下的历史现象的深刻理解,如果能用‘和而不同’的中国哲学观来透视中俄西北边境贸易的全过程，或许会对当年的历史有一种别样的理解，也会对今天的现实状态有一个更好的把握。实际的学术经验表明，任何研究所获得的史料往往只是当时万千材料中仅存的点滴而已，其余大部分都已经灰飞湮灭。因此,确定这仅存的点滴史料合理价值,全面地来理解它，采用最恰当的方式来加以引用，力求给每一则史料以最恰当的位置,从而避免肢解这些史料,在研究中使它成为一种学风,这是恢复历史的真实的重要原则之一，也能从中体现出作者的学养。历史学的科学性就在于它的真实性。冯友兰先生说过,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 识者,选材精当 才者,文笔精妙。笔者对各种史料正在熟悉当中，但是在选材方面确实是下了一番工夫。科学研究具有很大的不可预见性，或许这正是其创新性之所在，当你掌握了全面、精当的史料时,你会知道创新性在何处,你的研究向前推进了多少。

至于所使用史料，当然是分成层次的，而作者所搜集的，用一句话来概括，主要是档案。虽然人们对档案史料的看法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档案仍然是篡改和伪造最少、可信度最高的史料。作者认为本著作所征引史料本身并不隐含阶级的偏见。本研究所用一百二十多份各种中外文档案分别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和俄罗斯国家对外政策档案馆，所有的这些档案都是从未发表过的。

（二）

(1)国外研究状况述评

国外学者对中俄边境贸易历史的研究要数俄罗斯学者的研究阵营

为最强。其中最著名的专家学者有：米·斯拉德科夫斯基院士、阿·霍赫洛夫主任研究员、谢·阿尔达别科娃高级研究员等。这些专家学者集中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远东研究所及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等学术机构。他们研究的方向与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十月革命之前),中俄边境贸易的历史、俄罗斯政府对边境贸易的政策、边境贸易对西伯利亚地区民生的影响和对俄罗斯工业发展的影响等，他们也关心双边贸易对两国关系走向的影响问题。北部边境主要是恰克图地区，这里涉及有清一代的满蒙关系问题，他们特别关心俄罗斯和蒙古关系的历史发展。西北部边境主要是伊犁、塔城、阿克苏、布赫塔尔玛等地区，这里涉及满族与新疆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俄罗斯学者特别注意清政府对这里的政策，俄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和英国对中亚地区的渗透等问题，诸如伊犁问题、中俄西北部地区贸易的起源、俄罗斯旅行家在新疆地区的见闻、俄罗斯汉学家对新疆的研究等。俄罗斯学者关注中俄西北部边境贸易对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俄罗斯政府对边境贸易的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过程，为落实这种外交政策俄罗斯所开展的对华外交以及这种外交的效果等。俄罗斯学者学风严谨,选材严格,大多以档案材料佐证,较有说服力。但他们对档案材料的解释也有明显偏激的地方，对清政府的边贸政策研究得很少，结论似嫌不够能以理服人。另外在他们的研究中对中国的档案也常常利用。米·斯拉德科夫斯基院士于1974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他的《俄中民间贸易关系史(到1917年)》一书。该书考察了从1850年到1893年间恰克图贸易的发展与波折，考察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对恰克图贸易的影响，俄国政府为改变贸易中的俄方入超而在政策上所作的调整。在阿·霍赫洛夫主任研究员的大量关于恰克图贸易的论文之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恰克图及其贸易》(Кяхта и Кяхтин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该论文考察了18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这一百多年中，经过恰克图口岸所进行的边境贸易的过程，使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考察的基本是中国进入近

代之前的恰克图贸易情况。20世纪40年代前苏联出版了希林著《18世纪的恰克图》，该书对恰克图贸易与西伯利亚人民日常生活的关系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1978年前苏联乌兰乌德市出版了科·帕夫洛维奇的《恰克图城》一书。弗·库兹涅佐夫《19世纪前半期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3年)等。总的来说,俄罗斯的史学界对恰克图贸易和中俄西北贸易的研究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历史学界，恰克图贸易研究相对更透。

据笔者目前之所见，美、英、日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博士学位论文偶见以中俄关系史为题目的，至于直接以中俄贸易为题目的论著笔者见到的不多。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 Victor Zatsepine（维克多·扎切平）正在(2004年）以中俄东北边境贸易为题作博士论文。1994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伯特·加德拉教授的专著《丰收的群山》。书的副标题 福建与中国的茶叶贸易(1757～1937年)，时间跨度为180年。该书的某些章节可以作参考，比如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①

俄罗斯方面的档案材料很全，包括俄罗斯外交档案、著名人物的私人手稿、驻中国天津、上海、汉口、伊犁等城市领事们的商务报告 在莫斯科国立图书馆、莫斯科社会科学信息中心、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伊尔库茨克大学图书馆、海参崴远东大学图书馆等俄罗斯汉学研究比较好的地方（包括现在的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大学），均藏有丰富的19世纪50～90年代出版的书籍，其中涉及中俄贸易关系的统计资料和学术著作很多，比如，著名的俄罗斯汉学家阿·康·斯卡奇科夫(А·К·Скачков)的《论俄罗斯人在塔城的贸易》(莫斯科1860年版俄文）、1863年圣·彼得堡出版的《我

① 《*Harvesting Mountains Fujian and the China Tea Trade*, 1757～1937》*Robert Gardel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们在中国的商业》等。恰克图市博物馆也藏有大量关于恰克图贸易的材料，比如 19 世纪 60～90 年代的报纸。俄文杂志《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和《远东问题》(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常常刊登这方面的史料和论文。从史料方面来讲，要比中国国内丰富且系统。

综上所述，无论从资料方面还是从研究方面来讲，俄罗斯的史学界在中俄贸易关系研究方面已经超过了我国。因此，我们在研究时应该充分估计到这一学术现实，认真吸取国外学者、特别是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成果，要求参与研究人员的专业俄语水平应很高。

(2)国内研究状况述评

建国前关于中俄经贸关系的论著从 20 世纪初开始便不断出现。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计有王元相的《中俄陆路通商关系之历史上的变迁》、赵泉澄《俄领事新疆商务报告之发现》、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陈复光《有清一代的中俄关系》等研究成果问世。

建国后这方面的研究继续进行。西北边境贸易研究方面，主要的代表性论著有 厉声的《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00》、2000 年出版的庄鸿铸、吴福环、厉声、魏长洪合著《近现代新疆与中亚经济关系史》、林永匡的《西北民族贸易史》、袁森坡《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中苏经济贸易史》，其中包括了中俄经贸关系部分。还有一些研究晋商的著作也涉及西北部边境一些历史情况，比如张海鹏、张海瀛主编的《中国十大商帮》。

相关论文有：厉声的《新疆俄国贸易圈述略》、《废止俄商在新疆贸易‘暂不纳税’始末》、《〈中俄伊犁条约〉后新疆地区中俄贸易研究》,阎东凯的《近代中俄贸易格局的转变及新疆市场与内地市场的分离》，刘金萍的《20 世纪初期中国新疆与俄国的贸易》，李磊、田华的《清代新疆与俄国的贸易》,米镇波的《1845 年尼·柳比莫夫的秘密考察与（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签订》，郦永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

商章程〉再研究》等文章。[①]

除了西北边境贸易研究方面的成果之外，还有黄定天《尼布楚条约之前俄国对华贸易初探》、徐昌汉《关于尼布楚商队贸易》、宿丰林《尼布楚条约与早期中俄通商》和《试论中俄早期恰克图边境贸易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蔡鸿生《"商队茶"考释》、谢元鲁的《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薛瑞禄《从档案看光绪年间中俄贸易的发展》、白拉都其格的《1840年之前蒙古在中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周祚绍的《〈恰克图条约〉谈判中的清朝使臣》和《图理琛和〈恰克图条约〉的谈判》、吕妍的《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关互市始末》、周湘的《夷务与商务——以广州口岸毛皮禁运事件为例》和《清代毛皮贸易中的广州与恰克图》、许檀的《清代前期北方商城张家口的崛起》、赵士国的《康熙时期中俄关系论述》、孙连庆的《中俄贸易环境的历史回顾》、[日]冈洋树著、林杉译的《乾隆三十年桑斋多尔济等人对俄走私贸易事件》。[②] 2003年9月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米镇波的专著《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被清史学者评价为"是目前国内研究中俄恰克图贸易及其相关问题最深入详尽的著作。"(《清史研究》2004年1期)自1996年以来，《南开学报》先后发表了米镇波的《鸦片战争前后俄罗斯政府在恰克图地区禁止鸦片走私的政策》、《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倾销蒙古地区问题》等论文，其中有的文章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上全文转载。还有许多学者对中俄东北边境贸易做了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张凤鸣的《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1993年出版的厉声著《新疆对(俄)苏贸易史·1600至1990年》，时间跨度近400年，是全面论述此课题的学术专著，颇具价值。全书共十一章，清代中俄西北贸易是其中的一部分。全书使用了大量的中俄档案资料和文献资料。 2000年出版的庄鸿铸、

①许军、杨焕云《90年代以来清代中俄贸易研究状况述评》，未刊稿。

②许军、杨焕云《90年代以来清代中俄贸易研究状况述评》，未刊稿。

吴福环、厉声、魏长洪合著《近现代新疆与中亚经济关系史》,全书共五章,第一章的题目是《近代新疆与中亚的经济关系》。全书的时间跨度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计有一百数十年。

2001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马曼丽主编的《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研究》一书。该书用很短的篇幅简略地阐述了“近代西北边境贸易与西北边疆危机”。

此外，新疆大学、兰州大学、内蒙古大学的专家学者整理出版了许多档案资料集，如《新疆与俄苏商业贸易档案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在这部资料集中清代的内容不多，还有《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新疆民族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先生等主编的《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道光朝、同治朝、光绪朝、宣统朝,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① 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俄国通商税务档，共计约210件原档，每件页数最少的3页,最多的300页。但台湾研究这个题目的学者极少。笔者因作前述两个国家项目，所以手中掌握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俄国通商税务档约1700页，都是关键性的档案。第一历史档案馆方裕瑾先生等也整理过有关档案，曾在《历史档案》上发表。薛衔天、周新民主编的《中俄关系中文文献目录(17～20世纪)》已经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其中有《中俄经贸关系》一栏,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和文献目录索引。

（三）

笔者在完成了专著《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之后，对与有清一代的中俄边境贸易相关的若干问题有过一种思考，很认真的思考。相关

①马大正先生还有专著《清代新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问题主要是：

(1)对华边境贸易政策是俄罗斯对华外交的基本政策

俄罗斯对华政策的制定和俄罗斯的外交战略重点一直与欧洲有直接关系，对华政策是其欧亚总体外交战略的一部分。为了实现它的外交总战略，俄罗斯对华政策的基调一直是睦邻友好。睦邻友好并不意味着没有对中国领土的鲸吞，也不意味着双方在一些问题上没有争执，更不能说俄罗斯对中国在感情上如何，一言以蔽之，这是俄罗斯内政和外交的需要，是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使然。俄罗斯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它的欧洲部分与亚洲部分相比存在着的巨大的文化差别和生活水平的落差，这使该国发展的不平衡更加突出，这种不平衡甚至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对一个大国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成为俄罗斯国家发展的滞后因素。俄罗斯开展边境贸易所要达到的目的主要是：为工业品寻找市场，增加财政收入完成资本积累；解决远东地区居民的生活必需品来源问题和发展的基金来源问题；通过贸易来获得必需的农产品；加强对中俄相毗邻地区的影响以防止其他欧美国家对该地区的渗入，以确保中俄西北部和东北部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从历史的角度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一个缺少出海口、与中国有着漫长的边界线、幅员辽阔的俄罗斯选择边境贸易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是相当明智的举动。

(2) 俄罗斯在华边境贸易口岸布局的变动

一个陆路通商口岸的选择和确定涉及许多方面，诸如自然环境、地理位置、民族关系和民族传统、人文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等方面的问题，这不是本研究所承担得了的。本研究只是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被俄罗斯所开辟的对华边贸口岸的历史命运，并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历史命运后面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俄罗斯开辟对华边贸口岸的努力一直放在中俄边界中方的东北、北、西北三个方向上。最早开展并很快衰落下去的是中俄东北地区的边境贸易。最晚开拓的是中

俄西北地区的边境贸易，经过二百多年的历史的选择，对俄罗斯方面最有价值的是恰克图口岸。这个口岸由边境贸易转为陆路贸易而成为俄罗斯对华贸易的最重要口岸，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初。1850 年以后新开辟的中俄西北边境贸易口岸，没能满足俄罗斯打开新疆市场的愿望。到光绪十年新疆建省这里的局面才相对稳定下来。从此才能认为中俄之间正式的西北边境贸易已经开始。分析中俄西北地区边境贸易正式开展起来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A.新疆设省地区形势渐趋稳定；

B. 俄罗斯境内的铁路已经修到了中俄西北部边界；

C. 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修成导致恰克图贸易迅速衰落。

由此可以看出，在恰克图贸易和中俄西北边境贸易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历史真实。从时间断限上来分析，1881 年《中俄伊犁改订条约》签订之前，虽然是北部恰克图口岸和西北部伊、塔口岸并存，但主要的口岸仍然是恰克图。 1881 年以后,尤其是到了 1886 年以后，即光绪十一、十二年以后，新疆的对俄贸易突飞猛进，但其市场仅局限在新疆地区。恰克图口岸仍由传统的商道深入中国腹地，当恰克图口岸衰落下去时，清政府显得毫无思想准备，国内出口市场陷入混乱，清政府始关心西北口岸情况，然为时晚矣。

(3)清政府贸易观的进步

由于政局不稳、财政拮据、外交陷入困境，咸丰皇帝早已没有了康熙皇帝的那种自信，对俄罗斯打开西北边境贸易的动机，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充满了忧虑，对俄罗斯方面的通商要求采取了拖延时间和加以限制的立场。这种决策与新疆地区特殊的民族、人文、地理、社会背景有关，不能笼统地冠之以保守。清政府前后派出了多个大员前往处理新疆问题，在众多个大员之中，前有那彦成后有左宗棠是做得最好的。曾纪泽功劳卓著，也没有摆脱海防重于塞防观念的影响，在签约当中失误于主观臆断，因此给人们对他的评价留有了商榷的余地。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国内兴起了强大的救亡思潮，志士仁人对中国立国国策的运行轨迹进行了回溯，对西方列强称雄世界的原因进行了探求，对甲午之战中国之败进行了反思。在此之前陈宝琛就曾主张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通商院，甲午之战中国失败后，在举国上下的变法图强的呐喊声中,严复在翻译《原富》时就曾强调,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就是轻视贸易的作用。光绪十五六年间张之洞曾亲自组织货源，把湖南、湖北所产红茶数千箱委托给俄罗斯商人，装船运往敖德萨进入俄罗斯市场，从而开中国大员亲自参与出口贸易过程之先河，实属前无古人之举。光绪二十年以后，光绪帝曾多次强调中外交流对外贸易可以立国强邦，号召封疆大吏都来推动各地区的对外贸易，这都反映了清政府贸易政策的进步。这本应该成为中俄贸易的推动力，或许真会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看到中俄贸易发展新的春天到来，因为清政府贸易观的进步与中俄贸易现实之间的不协调是相当明显的。这个进步来得太晚。不仅如此，事实也证明清政府还不会在对外交往中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或许和清朝的国力有关。无论如何俄罗斯的对华边境贸易的政策是俄罗斯对华外交政策的核心，这个政策使两国的边界上相对地长时间地安定着，是一个双方都获利益的政策，也许获利更多的是俄罗斯。道光朝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是中央政权加强对新疆地区的控制和治理的关键时期。道光朝后期，中国社会进入了近代社会，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及其交往方式都有所改变,因此边疆地区的治理更显得重要。咸丰朝、同治朝、光绪朝处理新疆问题的所有举措，都是在道光朝奠定的基础之上实施和完成的。诸如伊、塔通商、左宗棠出兵新疆、伊犁交涉直到新疆设省,各项措施无一不与道光朝的治理息息相关。新疆地区的开放最直接的要求就是该地区的稳定，任何一个商人都不会把自己辛苦积攒起来的钱投到一个充满了变数的地区，当时的新疆就是这样一个地区。因此在清政府的贸易观未有重大改变之前，从道光皇帝开始，历代皇帝寻求新疆稳定之道是开

发新疆的另一条主线。笔者认为，到了光绪朝，清政府已具有了以边境贸易来求边境安定的自觉意识，这说明清政府对俄罗斯的认识和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都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第一章　道光朝平定张格尔作乱后的善后措施与俄罗斯对该地区的关注

第一节　道光朝中国西北部地区面临的复杂局面及其对境外部落政策

新疆地区卡伦以外的所谓哈萨克地区的情况非常复杂，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基本上位于中国和俄罗斯两大国之间，清政府的各种文献记载该地区是中国的属国，得到中国的保护和恩泽，约计有廓尔克、浩罕包括布鲁特、哈萨克、安集延等和坎巨提。

该地区在中国确立的卡伦或鄂博之外，清政府平定西域之后，划此地区为中国的领土，但把它交给了当地的哈萨克民人放牧，定期向清政府交租，清政府有专人定期出卡伦到彼地收租。道光五年九月间伊犁将军庆祥奏，八月二十六日巡查边界领队行至哈拉塔拉地方见有土房十间，系六、七月间，由俄罗斯属下头人布尔昆德克带兵三四百名来此建盖。“向例查边至勒布什克外五百里，始谓爱古斯河边界，勒布什克内七

百余里谓哈里塔拉，离博罗索吉尔卡伦仅四百余里，彼处断难令其侵占。”① 后由理藩院议奏，对西北事务非常了解的著名人物松筠向道光帝进言“从前或系哈萨克侵占俄罗斯游牧,今俄罗斯意欲讨还,哈萨克以一面之词，希图为其檄询，亦未可定。倘俄罗斯以本系哈萨克侵占之地,必应讨还为词,理藩院碍难查办。哈萨克游牧疆界与俄罗斯毗连,理藩院无凭可查，该将军似可以行查，理藩院并无伊等疆界图识，碍难查办。晓谕哈萨克以天朝定例,外藩之地,有疆界者,方可查办,无疆界者，例不办理,令其和睦邻封,似可毋庸行文俄罗斯,免生枝节。② 松筠作过库伦大臣、伊犁将军,主持修纂过一些关于西北史地的著述,比如,祁韵士的《西陲总统事略》以及在这部书的基础之上,由徐松完成的《新疆识略》,松筠对西北史地的了解有过人之处,他的话当可信。然而,庆祥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且也是引经据典，“案查乾隆朝二十二年我朝大兵平定准噶尔之后，追捕逆贼阿睦尔撒纳至哈萨克境内，哈萨克汗即称臣内附。哈萨克境距伊犁西北数千余里，而哈萨克之北，始与俄罗斯境界毗连。”庆祥所说伊犁西北数千余里之大概情况，与柳比莫夫所说的俄罗斯疆界当时划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是一致的。塞米巴拉金斯克位于额尔齐斯河之岸，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商人经常聚集于彼地贸易。庆祥认为“彼时我朝厘定疆界,凡削平准噶尔之地,即系圣朝边界。爱古斯、勒布什、哈拉塔拉均立有鄂博。哈萨克虽系臣服,仅只羁縻,并未收其寸土尺地。后因哈萨克贪逐水草时,有私人之事,每岁派兵驱逐,旋逐旋来。曾经大学士阿桂奏奉谕旨：爱古斯河以内不准哈萨克游牧，爱古斯河以外方许哈萨克游牧。嗣以驱逐为艰，蒙高宗纯皇帝以好生为心，念哈萨克迁徙之劳，将博罗霍吉尔、孔果罗额伦卡伦外千余里之地赏借给哈萨克游牧，哈立塔拉基在其内。乾隆三十二年，经军机大臣议

①《摘录道光五年俄罗斯私人边界情形原案折》，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十七日。
②《摘录道光五年俄罗斯私人边界情形原案折》，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十七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